



双减落地

习语回响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假如我是委员

相比义务教育阶段的“双减”，高中阶段的“双减”只怕落实起来难度会更大，毕竟高者的选拔还在，竞争也达到了白热化的阶段。禁止学校集中补课容易，只要不看升学率就行，但是想要让家长相信，在现有选拔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只怕难度会很大。

——虚拟委员 景图

回归教育初衷，让孩子健康、符合心理发展规律地成长，让孩子在稳定的状态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路，让家长静下心来，自我成长，陪伴孩子，而不是陪读孩子。

——虚拟委员 视界

孩子太苦了，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快大人；家长太忙了，与“双减”同步积极倡导开展课后服务托管和寒暑假托管，缓解了家长工作与“接送”“看管”的矛盾，深得人心。

——虚拟委员 乘风

“双减”后身边的培训班少了，但是还是心里不踏实，又想让孩子有快乐童年，又担心他学习不好考不上高中。我是通过努力学习考大学才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深知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双减”后孩子们作业少了，小学低年级也不考试了，就很难掌握孩子的学习情况，而中考依然要看成绩，学业压力依然存在，所以焦虑感依然存在。

——虚拟委员 华林



十月的内蒙古代钦塔拉草原，秋风送爽，稻花飘香。来自巴彦呼舒第五小学的学生们置身千亩稻田，充分感受科右中旗的秋日收获和家乡草原的美丽壮阔。本报记者 田福良 摄

让“双减”政策从落地走向深植

本报记者 吕菟

3月，开学季，中小学生在暖阳微风中踏进学校的大门，迎来“双减”政策落地之后的第二个学期。

通过上学期以及整个寒假的政策落实，不少中小学生在繁重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中解脱出来。据教育部近期新闻发布会数据显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书面作业的学生由“双减”前的46%提高到90%以上，73%的家长反映教育焦虑有所缓解，97%的家长反映对学校新学期的减负提质工作满意。数字虽然喜人，但这些显然不是“双减”政策的最终目标。要实现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破”重要，“立”更重要。

没有了课外培训的“加餐”，能否通过学校教育这道“正餐”实现各类学生的“营养均衡”？如何改变根深蒂固的唯分数唯升学观念？怎么实现课后服务系统性谋划、整体性推进？这成为一道摆在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面前的必答题。也是两会上，民主党派中央建言的思考题。

警惕“内卷”的惯性

“双减”落地，使作为教育直接参与者的学生、家长、老师的生活和工作，都发生了变化。虽然时间的自主权回归到学生手中，但教育内卷的惯性还在，不变的考试制度，让家长仍有这样的困惑：“换了时间，换了形式，一切似乎又都没有变。”

多个民主党派中央在调研中发现，在各学科类培训中，体育类培训的受欢迎程度尤为突出，几乎每位给孩子报课外培训班的家长都会至少报一项体育类培训班。在被问及原因时，家长们几乎都提到了一个理由，那就是体育成绩在中考成绩中的占比在不断提升。

这是家长最真实的内心写照，也是当前应试教育下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一些学校在“双减”过程中也表现躲闪。“双减”明确要求，严禁以任何方式公布学生成绩和排名，考试成绩实行等级评价。但一些学校，特别是中学，依照学生比例设定等级。比如，A等学生数量为学生总人数的10%，又依据成绩细分为A1、A2、A3、A4、A5多个等级。如此一来，学生在年级中的考试排名便一目了然，更有甚者，有的学校还在等级后面加一条数据分析：该生该学科打败了百分之多少的学生，排名更是精确到个位数。

凡此种种，都是分数排名的“变种”，都是“分数至上”观念的延续，充分说明传统应试思维惯性的强大，“双减”工作面临巨大的现实阻力。这也让各民主党派中央不免担心：在不改革中高考制度的背景下，推进减负措施，可能会陷入升学看分数、名次，减负要求不看重分数、名次的悖论。

民建中央认为，如果继续沿用单一的

考试分数、排名录取学生，基础教育很难摆脱应试倾向，这种状况下，学生的学业负担难以真正减轻，家长的焦虑也不会真正消失。因此，应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进一步引导家庭、学校、社会教育观念转变。加快建立以素质教育为导向的义务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实施学生发展质量评价、学校办学质量评价和区域教育质量评价。

同时，还应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尤其学习品质、成长过程及环境因素，建立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电子档案，将评价结果作为学校和教师考核的主要依据。坚持教考招一体化改革，推动“育分”向“育人”转变。

课后服务要“提档升级”

“双减”政策出台后，如何提高学校课后服务的品质和管理水平，成为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

民盟中央在调研中发现，当前课后服务供需矛盾较为突出，课后服务呈现整齐划一、形式单一、效率不高、学生不感兴趣等倾向。对于哪些内容可以进入课后服务，学校尚没有系统、多样、有质量的“课后服务清单”可以选择。课后服务项目急需的各类副科师资匮乏，校内教师不足，社会教师难以引入。各地出台的“双减”政策也缺乏关于课后服务质量的内涵界定和衡量标准，“双减”政策的成效评价机制、评价方案、督查督办存在困难。

对此，民建中央建议建立学校课后服务的准入制度和资源配送体系。根据不同年龄段教育目标，由教育主管部门订立课后服务目录和服务准入标准，不断扩充课后服务资源库。在推进“双减”的同时，推动“双增”：即减作业、增加体育锻炼；减培训、增加社会实践，在课后延时服务中增加学生参加户外活动、体育锻炼、艺术活动、劳动活动的时间和机会。

民建中央提出对课后服务开展教育督导，通过招投标、竞争性谈判、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遴选、聘请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退休教师及志愿者等参与课后服务，明确准入条件、程序、参与的形式、内容和任务，建立退出机制。

关于健全科学的评价激励机制问题，民进中央认为，应构建政府、学校、家庭一体化的评价体系，将义务教育质量评价、学生综合素质提升与课后服务有机结合，加强日常督导，将课后服务工作纳入教育督导专项内容。民进中央的建议是建立以家长与学生满意度为主，第三方机构监测参与的评价机制，开发基于可感知指标的过程性评价工具，建立覆盖决策、实施、评价和退出等环节的课后服务管理体系，加强家庭教育、家校共育，搭建学校—家庭—社会沟通桥梁。

“及时总结涌现出的好经验好做法也是十分必要。可以遴选一批家长接受、可推广、可复制的好经验进行宣传推广，为各地进一步做好课后服务工作提供有效参考与借鉴，促使课后服务这一利教好事、惠民实事，办好办实，不断办出新成效。”民进中央表示。

不能学生减负教师增负

民进中央在调研中发现，“双减”政策的推进过程中，出现了教师负担加重的问题。

首先是工作压力大幅增加，不少一线教师在岗时间达10—11个小时以上，繁重的工作负担使得教师开展教研等活动的空间被大幅压缩，专业发展受到较大影响。

同时，教师面临着综合能力提升的迫切要求。“双减”政策下，教师需要具备更强的专业教学能力，组织互助共学，开展分层指导；动态调节作业总量，差异化布置作业，开展主题实践活动；开设各类兴趣课程；还要具备多元评价的能力，转变教育理念，掌握评价内容、标准、方式方法，制定科学评价方案，在教学中实施综合且个性化的发展评价。

“针对‘双减’政策实施主体的教师，也一直未有相关的激励与保障政策出台，甚至一些地区连对‘双减’政策中教师权益的保护规定也未严格执行，这是必须高度关注并妥善解决的问题，应采取综合措施减轻教师负担，为教师提供有效激励与保障。”民进中央表示。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师资短缺问题更为突出。对此，民建中央建议盘活编内外教师资源，加强优质师资供给，建立教师编制动态统筹机制，对域内教师编制资源进行动态调整和统筹调剂，确保各学科教师增减基本与生源增减同步。创新中小学教师用人机制，合法合规地使用劳动用工、劳务派遣、劳务用工、人事代理等编外用人方式，积极吸纳优秀人才加入教师队伍，扩大优质教师资源供给。促进教师交流轮岗，解决师资配置不均衡问题。

综合运用经济和管理措施，为教师提供有效激励与保障也十分重要。民建中央提出核算课后服务成本，通过财政拨款、家长缴纳、社会捐助等方式做好经费保障。对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和相关人员制定补助标准，按照多劳多得、补助“从高”的原则按月及时发放，并根据发展实际积极创新保障措施，提升服务效能，切实解决教师的后顾之忧。

关于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问题，民进中央认为，应综合施策，精准支持，针对教师在“双减”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及时准确了解并提供有效的培训支持。搭建教师专业成长平台，开展常态化交流学习，引导和鼓励教师开展自主学习。



党派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胡文新：
加强校园体育促进“双减”落实

本报记者 刘方圆 实习生 李婷

“‘双减’的出台，让青少年在学校真正有了时间和空间发展体育运动，对于推动青少年体育是绝对的利好。”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冰联副主席胡文新说。

“双减”政策实施之后，学科类培训一定程度上“退潮”，为作为素质教育的体育培训腾出了空间。胡文新表示，体教融合对于青少年全面发展成长非常重要。学校不仅要加强校园体育课程建设，做好公共体育课的全覆盖，而且也要引导家长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观念，将原本用在学科培训上的时间和教育资金，投放于

让孩子体验更多运动项目，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

“目前，在校园还普遍存在专业体育人才队伍建设缺失的情况，提升校园专业体育人才队伍建设水平才能更好落实‘双减’政策，提高青少年体质水平。”对此，胡文新建议，要加大对各类高水平教练员、裁判员进校园的引进力度，这不仅仅能提升校园运动队的竞技水平，也为未来的教练、裁判团队作梯队储备，培养更多体育产业人才。“当校园体育发展到一定水平，还可引入营养师、物理治疗师等不同层面的辅助专业人员，提升学生的体能训练和运动康复水平。”

全国政协委员张大方：
以“减”促“增”培养多元化人才

本报记者 刘洋

“目前，‘双减’背景下的首个学期已结束，‘双减’政策取得初步成效，学生作业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经济和精神压力的支出均有所减轻，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缺少评判学生作业负担轻重的科学尺度、课后服务治理难到位等问题。”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张大方呼吁，进一步完善“双减”政策，实现教育上的“增效”。

张大方认为，当前“双减”政策实施仍处于过渡阶段，问题的凸显正好可以成为政策深入推进的良机。实施减负政策的义务教育是素质教育，但初升高和高中阶段的学习还

是竞争性的应试教育，竞争带来焦虑，“培优补差”的需求导致校外培训机构变相开展学科教学，校外培训“地上转地下”后家长所付出的教育成本更高，政府监管难度更大。

为此，张大方建议，厘清“负担”与“减负”事实，构建多维度均衡发展的达标评价，让教育评价体系成为“双减”政策落实的“指挥棒”，引导教育利益共同体对德智体美劳全面重视，同时设置相应的考试评价内容，减少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等应试教育现象，增强实践的开放性，以“减”促“增”，培养多元化、高质量人才。

委员声音

全国政协委员朱永新：

“双减”后，经费保障不应“姗姗来迟”

本报记者 吕菟

“双减”政策全面实施以来，对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营造良好教育生态，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政策推进过程中，也出现了相关保障不到位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在近期时间的调研中，就有不少“发现”。

“目前，很多地方财政无力对课后服务经费予以支持，经费保障以收费为主，这导致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补贴非常低，有的地方一个课时只发5元补贴，教师在工作时间明显变长、工作量增加的情况下基本维持从前的收入，工作积极性不足。有的地方试点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从校外培训机构引进相关课程和服务，但在‘双减’政策后，相关政策也在进一步收紧。”朱永新表示。

在他看来，“双减”政策的出台落地，代表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将进一步凸显，学校教育的任务和内容的都得到了扩充，教师工作职责和工作量的增加必然要求相关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建议充分考虑课后服务的管理、人员成本，在确定家庭的合理分担比例的基础上，核算不同类型课后服务的成本，并以此为依据，调整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标准。确保课后服务的经费充足，参与课后服务教师得到有效激励。”朱永新说。

他还提出在建立校外教育机构公共服务购买机制的基础上，建立校外教育机构公共服务购买经费保障机制，将校外教育机构公共服务购买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同时，积极推广委托管理，在教师配备、课程供给方面，拿出一定的比例，购买校外教育机构公共服务。

全国政协委员朱晓进：

统筹部署“双减”落实与风险防范

本报记者 江迪

“校外培训机构转型分流管理办法尚未出台，后续审批监管维稳难度大；教师延时服务财政补助标准低、兑现难，教师身心健康保障难度大；延时放学安全隐患排除难，乡村路况条件差，安全风险压力大。”全国政协委员、民进江苏省委主委朱晓进调研发现，“双减”政策落实过程中，配套政策未能有效同步进行，带来了一定的风险防控难度。

朱晓进提出，“双减”政策是以破釜沉舟的勇气重构基础教育育人体系，以责无旁贷的担当重构基础教育良好生态。为推动这项利民的政策取得更好成效，要统筹部署落实与风险防范，同步推进政策配套与工作推进，做好安全与保障工作。

朱晓进建议：适度提升基础教育阶段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探索制定省内分区分层分类延时服务收费指导意见，明确场地、交通、餐饮、师资和机构准入条件，及时足额发放教师延时服务补贴；出台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设置标准和审批监管工作细则，给学科类培训机构分流转型提供通道，减少优质教育资源的流失，切实关切其调整阵痛，支持帮助其渡过难关；充分考虑延时服务学生校内校外安全，不搞时间和场地“一刀切”，做好安全风险防控，让学校和家庭拥有更多教育自主选择权，回归教育的初心使命。

全国政协委员徐星：

“双减”后中高考录取方式应有大突破

本报记者 照宁

校外培训的“虚火”退了，家长们的“心火”还在，主要“症结”在于中考和高考还是择优录取。“‘双减’的背景下，大学和高中录取方式应有大突破。”全国政协委员徐星告诉记者，今年两会，他要为中考、高考改革“呐喊助力”。

“近年来的教育举措极大缓解了教育领域的压力，但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徐星认为，例如高校自主招生有助于鼓励素质教育，但也存在弄虚作假现象和引发教育不公平；“双减”政策解决了很多问题但家长和学生的校外教育需求依然存在。

“高考和中考是中国家庭的两个指挥棒，是所有家庭努力的方向。”徐星表示，我国大学和高中录取基本依据高考和中考分数，因此，建议从源头解决问题，进行大学和高中录取方式的试点改革。

“高中和大学录取分数从依据中考和高考成绩改为依据学生的综合分数，综合分数由三部分组成，即中考和高考成绩、平时在校考试分数以及德育美劳的平时表现计分。”徐星建议，建立专门机构研究三部分分数在综合分数中构成比例的合理性，完善中小学平时考试公正评分和分数档案制度，建立和完善中小学德育美劳的平时表现计分体系，监督中小学平时考试分数以及德育美劳的平时表现计分体系的运行。

全国政协委员李莉娟：

提高师范生核心素养助力“双减”落地

本报记者 孙金诚

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学生学业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有效减轻，人民群众对教育满意度明显提升。

然而，全国政协委员、青海民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李莉娟调研发现，应试教育背景下形成的各类培训热、名校情结依然存在，同时，社会和家长对基础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强。

究其原因，她认为，这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育是否能达到优质均衡，教学质量、效能是否得到有效提升息息相关。

“人民期待高质量的教育，国家需要具有创造力的人才。”李莉娟说，跳出单一、同质化的教育模式，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机制，才能助力国家经济发展，回应家长对教育的需求。

为此，李莉娟建议，在师范生教育中真正体现“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在全社会真正形成尊师重教的风气，持续提高教师待遇，让更多人愿意从事教师行业；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缩小地区差距，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形成以引导、培育先进教育理念为主的教师培训常态化机制；相关部门从政策上支持将地方院校培养的师范毕业生安排到当地中小学任教。



(微信扫一扫，使用小程序)